

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 在全世界

——记1988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

究竟哪里是敦煌学的发祥地? 这个争论了几十年的老问题如今有了满意的答案——“敦煌吐鲁番在中国, 敦煌吐鲁番学在全世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季羨林先生于八月二十日在“1988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提出的这一看法, 得到了与会近三百名来宾的一致赞同。

本世纪初, 随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隋唐写本的流失, 逐渐在国际上形成一门新的综合性学科——敦煌学, 由于各国对所收藏的敦煌出土写卷研究的时间与进展程度各异, 舆论界先后传出, 敦煌学在法国、在日本、在中国……的呼声。纵观人类社会, 任何一门科学绝不可能只属于某一国家, 闭关锁国永远赶不上历史进程。只有相互交流、取长补短, 才能兴旺发达。有人说科学没有国界, 敦煌学正是如此。

出席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代表来自十个国家和地区, 他们中有久享盛名年逾古稀的老前辈常书鸿、王永兴教授及日本的腾枝晃名誉教授等; 有一大批才华横溢, 年富力强的中年专家, 如姜伯勤、宁可教授及池田温教授(日)和梅弘理研究员(法)等; 最为可喜的是35岁以下的青年代表比例占全体代表总数的五分之一, 比上一届讨论会有了明显的改观, 他们是国际敦煌学的希望。其中北京

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的荣新江讲师最引人注目, 他年仅28岁, 科研成果颇多, 被推选为第二届学会理事。

这次大会共收到论文146篇, 其中16篇来自国外同行之手, 涉及敦煌吐鲁番学的各个领域。与上届讨论会不同的是, 敦煌音乐, 舞蹈的研究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了进行这一方面的学术交流, 中国舞蹈家协会特意为大会安排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舞蹈晚会, 各国代表欣赏了我国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和日本美二三枝子舞蹈团的表演。

讨论会以学科分为七个小组, 中外学者对每一个问题都产生浓厚兴趣。发言积极、争论热烈、气氛异常活跃, 交流学术的同时增进了相互的了解, 这里不分国籍与政治倾向, 大家目的一致, 就是加快国际敦煌学的研究步伐, 使本来属于全人类创造的灿烂文化早放异彩。

代表们在紧张的安排中抽时间参观了位于京西的“北京敦煌”云居寺, 各国来宾在这里又一次为丰富的中华文化感叹不已。

讨论会召开的同时, 设于北京图书馆分馆内的“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心”正式对外开放, 并联合北京大学图书馆、旅顺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了“敦煌吐鲁番珍品展览”, 各国代表面对举世闻名的珍贵文物, 留连忘返。

附: 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心简况

(一)

一九八三年八月, 在兰州召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暨学会成立大会上, 常

书鸿、任继愈、季羨林、段文杰等二十二位学者联名上书给中央领导同志, 申述在我国开展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意见, 并请求国家财政拨款、支持资助在北京、兰州、乌鲁木

齐三地分别建立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主要任务是全面系统地搜集资料,协助文物考古部门在国内普查文书文物,并通过有关途径把分散在国外的资料复制回来,编出总目录,为全面开展综合研究提供条件。

材料上报的第二天,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即圈阅。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并作出批示,责成有关部门办理此事。教育部建议:“鉴于敦煌吐鲁番学会由教育部协调组织,因此工作和财务关系希望继续挂靠于教育部”。1983年11月11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复,学会正式挂靠于教育部,工作亦由教育部指导。学会得到国家五十万元财政拨款后,即与北京图书馆商议共同筹建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心事。

(二)

北京图书馆庋藏我国古籍源远流长。南宋皇家图书馆——辑熙殿原藏、宋刻本《文苑英华》至今仍是该馆藏书中的瑰宝。其后,随着《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等史籍的不断收入,进一步丰富了该馆藏书的内容。

敦煌遗书于1900年面世后,连同各国探险家的“业绩”,相继被送入许多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12个国家和地区,30余个单位藏有敦煌出土文书文物。清朝学部于1910年接到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通报,匆匆将剩余的八千余卷写本运进北京,交北京图书馆(旧称“京师图书馆”)保管。这是北京图书馆入藏的首批敦煌资料,也是我国官方收藏的第一批敦煌宝藏。嗣后,经过70多年的刻意搜寻,至今已达一万余卷,成为世界上藏有“遗书”原件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北京图书馆对敦煌遗书的整理研究工作亦有较长历史。早在1911—1912年间,京师图书馆刚接收这批材料不久,即编出了一个

草目,和一个两千多卷的详目,以及一部由著名佛学家李翊灼编定的《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1922年由曾任北京图书馆馆务委员会委员长的陈垣先生主持,在俞泽蓁先生协助下,将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经卷,作了一次全面的检阅、考订,详细记录了编目工作中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和资料。其后,以两年之力仿效赵明诚《金石录》的体例,将所收资料编写成《敦煌劫余录》一书,(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排印本)初步确定馆藏敦煌经卷8679卷,这部目录一直使用至今。

1929年北京图书馆成立写经组,由胡鸣盛、许国霖二先生重编了专供阅览用的目录,许先生还编成了《敦煌石窟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6年铅印本)。他从9871卷中辑出四百多条写经题记,又抄出了其中卷背、卷尾及个别卷子中的变文、偈赞、音韵、文疏、契约、传记、目录、杂类等文献,以满足读者的需要。

本世纪三十年代,袁同礼先生主持北京图书馆工作期间,曾拟定《整理选印敦煌经卷计划书》,对总目、辑印、考校等工作提出具体意见。并于1934年委派索引组组长王重民先生前往法国巴黎图书馆工作,王在法期间,以访求敦煌遗书为其工作重点之一。袁同礼先生还多方筹资,支持该馆编纂向达先生在英伦收集有关敦煌资料工作。十余年后,王重民先生晋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将其在法汇集的材料编成《伯希和劫经录》一书,此时,向达先生也完成译著《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这两本书供我们了解了英、法两国所存资料的重要内容。

本世纪五十年代、七十年代,该馆还分别入藏了英国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和法国巴黎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胶卷一万余卷,从而使敦煌出土的大部分遗书资料皆汇集于此。1980年前后,北京图书馆将其缩微复制为胶卷,广泛地供应国内外各单位使用。

1981年7月,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将1931年以后(特别是1949年后)陆续收集的一千五百余件敦煌遗书加工整理、编成《敦煌劫余录续录》胶印出版。

(三)

1983年冬,北京图书馆决定接受教育部的建议,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共同创办北京资料中心。五年来,该中心在学会和北图的扶持下,顺利完成了筹备、组建、初创、工作等几个阶段。现该中心配有高、中、初级专业职称人员13人,分别承担着系统搜集整理、庋藏敦煌吐鲁番学有关资料;编辑出版有关目录论集;开展为国内敦煌吐鲁番学界提供阅览咨询;为国外敦煌吐鲁番学文化

交流服务等工作。

设在北图分馆(文津街七号)的中心阅览室已于今年八月二十日正式对外开放,开架借阅资料中心收藏的全部中外文书刊及缩微型资料四万余件。该中心围绕有关资料和课题已开展编辑整理研究工作。现已开始出版“敦煌吐鲁番资料丛刊”,第一批出版的书目有:《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敦煌吐鲁番文集》《敦煌吐鲁番论著目录初编》(欧文、日文专著部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索引》、《敦煌吐鲁番资料目展览录》等。他们还拟编辑出版《敦煌吐鲁番论著目录初编》(中文部分)、参与交换国外有关资料、修复缀合断卷写本、鉴定辨别遗书真赝等。

(尚林)

台湾“立法委员”胡秋原先生参观北京图书馆

1988年9月台湾“立法委员”,《中华杂志》发行人,“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胡秋原先生偕夫人、女儿参观了北京图书馆。

副馆长杜克在东大门前迎接了客人。身着银灰色西服的胡先生已是78岁高龄,但精神矍铄,兴致勃勃。馆长任继愈在贵宾接待室门前迎候胡先生一行。宾主寒暄入座后,任继愈代表北京图书馆对胡先生来访表示欢迎并赠送《北京图书馆纪念书画集》和《敦煌》两本画册及他本人的一部著作。胡先生非常高兴,回赠了他的几部新著。接着,杜克向胡先生介绍了北京图书馆的现况。在离开贵宾接待室前,胡先生挥毫在贵宾留言簿上题字“图书之府”。随后,胡先生一行在任继愈、杜克等陪同下参观了《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当他看到保存完好的《四

库全书》全套真品时,胡先生啧啧称赞:太难得了。走进善本阅览室,坐在读者阅览的座位上仔细地翻阅图书目录分册,他对任馆长说:“从事这些善本典藏的老同志,老专家现在难得,应得到保护,并积极扶持新人,使之后继有人。”接着参观了目录厅,当胡先生的秘书在中文图书目录港台部分查到了胡先生的著作条目时,他兴奋地告知了胡先生,先生看后,开心地笑了起来,女儿在一旁将这些目录拍了照。

时间不觉已到4点,因有其他活动安排,胡先生不得不离馆了,他连连地说:“日程安排太紧,参观时间太短了,想看的地方还有许多,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做为一名普通读者来。”随后,与本馆陪同人员一一握手告别,驱车离馆。

nature and religion. This article giv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ei-Tang collection, as well as its formation, contents and specific features. The author praises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is collection. (page 47)

*On the Retrospect of Research into Basic Theories of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Prospect of Research into Utilization and Exploitation*

On the basis of knowledge exploitation, some five phases are here mentioned, namely,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knowledge, technical products and society decision-making which are worthy of study.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based on his experience and benefits as both writer and reader, gave quite affirmative assessment of the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in its ten years (1979—1988) contribution to the yielding of results and upbringing of qualified personnel. (page 70)

*A Report of the 1988 China Seminar of Tunhuang and
Tibetan Academic Attainments*

This Seminar was held Aug. 20-25, 1988 in Beijing. Over 200 delegates from 10 countries and areas attended the Seminar. Prof. Ji Xianlin was once again elected chairman of the Society, and he issued the call to give due importance to Tunhuang in China because the academic attainments of Tunhuang are being enthusiastically studied. During the Seminar, the Beijing Data Center of Tunhuang and Tibet which was situat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was formally open to the public, and the Library simultaneously gave an exhibition of Tunhuang and Tibetan materials.

During its 70 years of service,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never ceased the work of collecting and researching into Tunhuang materials. The newly established Beijing Data Center of Tunhuang and Tibet set as its task to collect, edit, process and to publish catalogues and monographs, and to offer reading and reference service to scholars home and abroad. (page 87)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announcement;

1. With regard to the ISSN of this BULLETIN, ISSN 1000-1042 has been printed in error for ISSN 1000-0402 in all its 1987-88 issues.
2. This BULLETIN adopted the ISSN beginning with its second issue of 1987, while simultaneously it related the beginning and ceasing date as well as the volume and issue number of its predecessor.